



百家文库
BAIJIA WEN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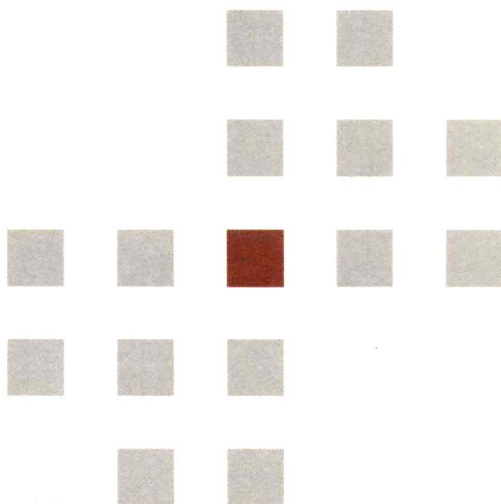
理解与误读

——百年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中的
“勃兰兑斯现象”研究

LIJIE YU WUDU

——BAINIAN ZHONGGUO XIFANG WENLUN JIESHOUSHI ZHONG DE
“BOLANDUISI XIANXIANG” YANJIU

李夫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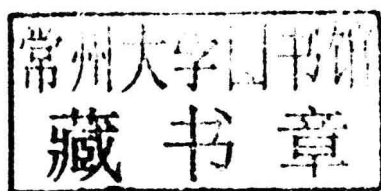
湖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752014）

理解与误读

——百年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中的“勃兰兑斯现象”研究

李夫生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著以文学现代性为基本视角,借助“理论旅行”、“文学变异学”等理论资源,展示了勃兰兑斯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并着重剖析了“勃兰兑斯现象”的构建过程中的理解和误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与误读——百年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中的“勃兰兑斯现象”研究/李夫生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667-0313-2

I. ①理…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7205号

理解与误读

——百年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中的“勃兰兑斯现象”研究

LIJIE YU WUDU

——BAINIAN ZHONGGUO XIFANG WENLUN JIESHOUSHI ZHONG
DE “BOLANDUISI XIANXIANG” YANJIU

作 者:李夫生 著

责任编辑:祝世英 责任印制:陈 燕

印 装:长沙国防科大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6开 印张:14 字数:259千

印 次: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版次:2013年3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5667-0313-2/G·583

定 价:32.00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343(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zhusy@hnu.ed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言

夫生是我的一个较为勤奋的学生。

从夫生开始跟着我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们这个团队开始有意识地将我提出的曾引起文艺理论界热议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转化为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思考。我认为，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两个比较典型的范例，一个是佛教文论，一个是马列文论。夫生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出来的，出版后，受到学界同仁的好评。

由此，夫生的学术研究就沿着“西方文论中国化”这个方向深入下去。近些年，夫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他特别专注于对近百年来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中一些独特的个案研究。很显然，他的这本专著——《理解与误读——百年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中的“勃兰兑斯现象”研究》，就是这个研究方向下的又一个新的学术成果。

正如韦勒克所谈到的，勃兰兑斯在西方文艺理论批评领域中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理论家。但是他在中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这里面涉及理论旅行过程中“历史”与“情境”的变化，也涉及我们近百年的西方文论接受史中“理解”与“误读”的问题。

在学界同仁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夫生在这部著作里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概而言之，我认为有这么几方面的优点：

一是作者的较为敏锐的“问题意识”。据我所知，这是国内首部较为全面而专业地讨论“勃兰兑斯现象”的著作。以前，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理论，尤其是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进行过一些研究，也有少数敏锐的学者关注过“勃兰兑斯现象”，但还没有人全面系统地梳理勃兰兑斯的整个理论体系，更没有人就“勃兰兑斯现象”进行过如此详尽、深

入的研究。相信夫生的这部著作对于学术界深化这个问题的研究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是作者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夫生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维度来阐释现代中国近百年来勃兰兑斯的接受过程中的“理解与误读”，论述细致而深刻，具有较大的理论说服力。同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作者的研究立足于比较文学学科，运用了“理论旅行”、“变异学”等理论资源来研究“勃兰兑斯现象”，方法灵活多变，而且运用得较为得心应手，一些观点也颇有创见。

三是作者研究的系统性。夫生的“勃兰兑斯现象”研究，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个案系列研究中的一个研究单元。按照作者的研究思路，这是既有相对固定的研究范围，又有相对开放性的“学术链条”中的一环。从作者前一部专著《现代中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开始，作者计划进行相关的系列研究。这部著作是这个学术研究系列中又一重要成果。以夫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再加上他的勤奋努力，我相信，这个学术链条今后会更加扎实、牢靠。

作为老师，最欣慰的事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学生不断进步。夫生学术事业上点滴的成就，都让我感到极大的欢欣。望夫生在学业上能有更大的进步！

曹顺庆

2012年12月2日

目次CONTENTS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3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5
第三节	基本思路和框架	9

第一章 文学与文学史书写

第一节	什么是文学	13
第二节	文学史书写	17
第三节	西方文论接受史的叙事法则	23
第四节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	28

第二章 勃兰兑斯及其文学批评

第一节	勃兰兑斯其人	67
第二节	勃兰兑斯时代的丹麦	72
第三节	勃兰兑斯的文学理论思想	74
第四节	勃兰兑斯文学批评中的理论张力	88

第三章 “期待视野”与精神耦合

第一节	勃兰兑斯传播的三个阶段	101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的“期待视野”	118
第三节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文学知音	146

第四节	“个案”与“症候”	163
第四章 勃兰兑斯现象		
第一节	时间神话与社会进化	183
第二节	启蒙图存与爱国主义	189
第三节	“建构性”的勃兰兑斯	194
第四节	理解与误读	201
参考文献		211
后 记		217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三节 基本思路和框架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1966年，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发表了两篇论文《词、对话、小说》和《封闭的文本》。在这两篇论文中，她吸纳了俄国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 Mikhail Mikhailovich, 1895—1975）的相关理论，正式创造并引入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在三年后的著作《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中，她再一次强调了这个概念，并指出：“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①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理论界迅速的认同，很快就形成一股研究热潮。有趣的是，“互文性”概念本身也在理论提炼和熔铸中不断丰富和深化。互文性既指文本之间本身具有相似性，又指文本互涉或关联，从一个文本启迪孕育另一个新的文本。有理论家也称这种现象为“文本间性”，意即在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一个新文本的成长空间，并且能够促成或生产出另一种与之成或然关系的新文本。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近些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场域。很多学者倾尽精力研究各种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文学界接受并消化西方理论的过程。研究者入思角度不同，思考和切入问题的方式各异，但目的都在探讨如何精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果。

“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是由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提出来的一个关于知识生产的基本概念。其关注的重心是一种理论在不同民族和文化转换生成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和差异。在赛义德的理论中，他提出了两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历史”（history）和“情境”（situation）。他一再提醒人们，要关注理论旅行中理论发生和变异的

^① 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历史语境。即重新回到理论发生和变换的现场，回到理论生产的历史语境中去。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理论中，“历史”是一种流动的时间观念，是发展变化的时间范畴，而“情境”则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情况、发生新的质变和量变的场域，是变幻无穷的空间范畴。因此，如果我们运用赛义德的这种理论对知识生产进行考量，就必须采取一种动态的历史观。任何一种将时空凝固化的论述，都有可能陷入僵死的理论误区。

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是，在进行“平行研究”的时候，事实上也离不开历史化了的“影响研究”。每一个研究单纯依靠平行方法或者影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完成。这就告诉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要向着更加多元的方式转换。如果我们曾经把求同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共识，那么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则更加开放，更加关注比较研究中的差异性。这或许成了当下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变异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个理论所关注的重点不在于理论发生了多少“旅行”，而在于它在“旅行”过程中有哪些变化和发生了哪些差异。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研究，需要关注两个语境：一个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发生的背景；一个是这种理论批评“旅行”和被接受的背景。唯有回到历史，回到现场，我们才能接近理论本身。

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我曾参与过西方文论中国化课题的一些研究工作。几年前我曾完成了“现代中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课题的探索，同名专著也已经正式出版。在进行马列文论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我留意到了现代中国西方文论引进过程中的一些普遍情状。从西方文艺理论在引进到中国之后的沉浮起伏，特别能够窥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认为，解析勃兰兑斯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对研究现代中国西方文论引进史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本书的撰写，正是在这么一种学术背景之下开展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课题在“互文性”意义上的展开。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到“丹麦评鹭家勃兰兑思”起至今，勃兰兑斯（G. Brandes，1842—1927）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被介绍到中国已经百年。勃兰兑斯在中国百年文学批评史上的接受与传播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勃兰兑斯最早是作为“精神界的战士”受到人们的热捧。对勃兰兑斯的研究和翻译，也偏重于从这个方面着手。除鲁迅外，郑振铎、沈雁冰、郁达夫等文学大家都曾介绍过勃兰兑斯，林语堂也曾翻译并编撰过勃兰兑斯的作品。后来成为革命家的沈泽民、张闻天等对勃兰兑斯及其作品也有过重点介绍和翻译。

正式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译成中文的功臣首推韩侍桁。从1936年起，韩侍桁所译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前四卷（1936年推出第1，2卷，1937年和1939年又分别推出第3，4卷）。该书的第5，6卷却未能出版。抗战胜利后，韩侍桁从后几卷中抽出部分章节，分别辑成《拜伦评传》、《法国作家评传》和《海涅评传》，由国际文化服务社于1948年至1953年陆续出版。至此，勃兰兑斯的著作不仅为中国读者广泛了解，也成为五四以来唯一较为完整的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史著作。由此也可理解，韩侍桁的译本一经问世，就受到读者界的普遍关注。^①

新中国成立之后，勃兰兑斯虽然没有像新文学运动时期那样受到普遍关注，但对其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却走向正常轨道。1950年代，韩侍桁已基本完成了全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中文翻译工程。勃兰兑斯的文学观进入

^① 韩侍桁的译本出版后，受到好评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严厉批评。如邓广铭先生就对韩译进行了措辞较为严厉的批评。详见后文。

到当时的文学批评具体实践中。

在勃兰兑斯著作的传播过程中，翻译家韩侍桁的翻译功不可没。

1980年代，勃兰兑斯再度蹿红，对勃兰兑斯的引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19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中国当时可谓最优秀的翻译家如张道真、江枫等，或从英文版，或从德文版，或相互参照，翻译、出版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6册，使得这部巨著以完整、精切、生动、耐读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新译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翻译家全是一线译者，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和外国文学知识积养；二是参考各种版本，相互印证，译文更为真实可信；三是译文风格沉稳与激情相映成趣，统一与独特共融相合。因此，这个译本可算是翻译史上一个较大的工程，也是较为成功的范例。

一些作家、批评家在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屡屡用勃兰兑斯作为生动教材，对新时期文学现象进行批评。比如著名诗人兼评论家绿原、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等在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都对勃兰兑斯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将其批评方法运用于自身的文学研究中。

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与勃兰兑斯同期引进的批评家大多归于沉寂之时，勃兰兑斯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时期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从文学批评接受史的角度对这个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给予关注。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杨冬、朱寿桐等人的研究用力最勤。

杨冬先生长期致力于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长期的学术积养，使得他的问题意识异常敏锐，能够在五花八门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披沙拣金之力，既对西方理论加以介绍，又对这些理论加以甄别。他的勃兰兑斯研究系列论文就体现了这种深刻的洞察力。

杨冬先生的《百年中国批评史中的“勃兰兑斯问题”——关于勃兰兑斯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一文，是近年来研究勃兰兑斯文学批评理论最有价值的一篇论文。与一般的研究者不同，杨先生的问题意识集中于勃兰兑斯在中国的传播际遇上。

在文学批评史上，勃兰兑斯并不是一个最为杰出的理论家。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也不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在西方，虽然在勃兰兑斯生前

有过一段时间的勃兰兑斯热潮，其著作曾被视为比较文学的典范作品而广为传播，但到1960年代，勃兰兑斯在德国和法国几乎无人知晓，在英美两国也已徒有其名（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在中国，勃兰兑斯却受到特别的礼遇——从新文化运动到当代文坛，他始终让中国学界青睐有加。为什么在百年西方文论接受史中，许多西方批评家大都被人遗忘，而勃兰兑斯却总能找到“知音”？为什么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中国始终受到青睐？这种种情形，构成百年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上独有的“勃兰兑斯现象”。杨冬先生这篇论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了勃兰兑斯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更在于启发人们：为什么一些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界影响并不特别重大的理论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却有着非常礼遇，形成一种特殊的传播际遇？而一些世界很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中国却未必能引起足够重视？杨冬先生的这些研究对于开启人们的研究思路具有开拓之功。

朱寿桐先生的研究则呈现出另一种学术旨趣。他更侧重于勃兰兑斯理论文本的研究，体现出精锐的“细读”之功。他相关的系列论文对勃兰兑斯批评理论关键词进行解析，其中不乏精妙之处。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对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进行了通俗化梳理，他的专著《宽容的魔床——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导引》以通俗而富有个性的文字，简明扼要地把勃兰兑斯的皇皇大著梳理得清清楚楚，这是一种将深奥生涩理论通俗化的有效尝试。朱先生的这本著作，在散发着极其个性化魅力的文字中，捕捉到了勃兰兑斯文学哲学的不朽之点：自由的激情。因此，这部著作的精义不在于拥有如何精致的学术性，而在于流播于整部著作中的探索文学自由的精神。

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理论在19世纪虽然轰动一时，但经过岁月的洗涤，现在已慢慢归于沉寂。在国外的勃兰兑斯研究中，否定性批评占据主流。早在1905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沃尔特·雷利（Sir Walter Raleigh, 1861—1922）就直言不讳地指摘勃兰兑斯一无可取，“他不过是一个欧洲大陆犹太型文化贩子。他不懂什么是诗。津津乐道他的琐屑教条，即理性至上，进

步，启蒙——全是绝对抽象说法”^①。韦勒克沿袭了欧洲文学批评界对勃兰兑斯的主流看法，在欧美的勃兰兑斯研究中具有代表性。作为美国“新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擅长用“细读”（closed reading）的解析方式来解读所有的文学文本。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可谓一部极富个人色彩的、才华横溢的批评著作。他把勃兰兑斯置于近代名流辈出的批评家行列中加以考察，肯定了勃兰兑斯对基尔恺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和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等的推介评价之功，认为他“精力旺盛，求知欲强，所以成为几国文学之间的重要媒介。对于自己的国家，他变成了一个新纪元的先驱。……他具有独到的，沸腾的感受力，深入心理的洞察力，理顺潮流和运动的能力……”^②，但对勃兰兑斯的文学理念本身却批评得相当尖锐：“他只是一个中人，没有独创之处和实质内容。”^③韦勒克归纳出勃兰兑斯评判文学的几点依据：“文学是否‘摆出问题加以辩论’，是否有助于进步，政治自由化，宗教思想自由，促使人们对现代科学及其决定论与进化论学说产生共鸣。”^④从韦勒克的叙述中，他对勃兰兑斯上述批评观念颇有些不以为然。事实上，他认为勃兰兑斯以一种固化的观念来考察文学，与19世纪文学主潮的实际状况并不十分相符。

① 转引自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② 转引自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③ 转引自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④ 转引自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485页。

第三节 基本思路和框架

本著作企图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为基本入思角度，从两个关键词——“认同”和“误读”出发，探讨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勃兰兑斯是如何进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如何满足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理期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接受机制是如何得以建构的。研究拟将分为几个步骤：

首先，梳理有关文学和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概念，探讨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过程中文学史的形塑过程。

其次，介绍勃兰兑斯的基本批评理论，着力考察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几个方面。借助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考察勃兰兑斯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过程。正是勃兰兑斯具有的独特个性魅力的批评理论，构成了勃兰兑斯的映像，吸引了中国作家的高度注意力。而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启蒙需求、救亡图存现实以及民族国家想象等，相应地构成了中国文学界对勃兰兑斯的期待视野。两相耦合，从而构成“勃兰兑斯现象”。

再次，借助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的误读理论（the misreading theory），考察百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对勃兰兑斯及其理论的误读是怎样形成的。正是因为上述种种特殊语境的限制，使得勃兰兑斯及其理论在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接受过程中存在着种种误读：对其浪漫主义历史文化——心理批评的偏重，则有意掩盖了其中的机械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审美倾向；对其“科学的比较研究”的倚重，则忽略了他对文学整体性的粗糙评价，尤其是忽略了他作为文学批评史家对作品应有的“细读”、精究的严重缺失；让勃兰兑斯理论穿上俄苏文学理论的外衣，则显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再度开放时对勃兰兑斯的重新认识，仍然打着

深深的机械唯物论的印记。总之，对勃兰兑斯及其理论的误读，既有“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下的“创造性”、“对抗性”，也有我们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及视阈甚或某种意识形态去加以解读的“无奈性”。

最后，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勃兰兑斯现象”的理论特征，探求其学理成因，以求得新的理论启发，从而总结百年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为西方文论的中国转换提供应有的理论支持。

本书写作的思路和方法是：试图以比较文学理论中的“流传学”、“变异学”为理论依托，同时借鉴后殖民批评中“理论旅行”理论、接受美学等理论资源，对百年中国西方文论接受史中“勃兰兑斯现象”进行解析。

本书对“勃兰兑斯现象”的研究，固然要论及勃兰兑斯及其理论，但重点则在于通过勃兰兑斯这个特殊的学术个案，回顾百年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与消化过程；通过解析勃兰兑斯及其理论在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中的接受与传播过程，挖掘其理论被认同、被误读的内在原因。